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之行

● [美] 费正清 著

● 赵复三 译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之行

〔美〕费正清 著

赵复三 译

新华出版社

外国人看中国抗战

中国之行

[美]费正清 著

赵复三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插页2张 115,000字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011—0135—3/I·21

统一书号: 10203·235 定价: 1.50元

前 言

许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各国新闻界的极大注意。世界各国曾有无数的立场不同的新闻记者，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络绎不绝地来到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度。但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红色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称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

首先冲破这种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一九三六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的英雄的革命业绩。接踵而来的，是他当时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即尼姆·威尔士），写了著名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此后，他们都又多次访问中国）。接着，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爆发了持续八年之

久的抗日战争。这个时候，先后曾有许多外国记者，沿着斯诺所走过的路，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或者深入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解放区进行采访。他们在这里同中国解放区军民亲切相处，目睹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政权的封锁，创造出人间奇迹的情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也和埃德加·斯诺一样，精心观察、研究中国，写了许多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情况的著作。在这里，他们不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旁观者，而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他们热情地讴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严正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有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到过解放区，也常利用各种机会，访问中国共产党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搜集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解放区的资料。尽管他们具有不同的国籍，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但都毫不例外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这个时期，由于这些来华的外国记者的努力，产生了大量的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著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象斯诺一样，为促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而奋斗不息，作出了贡献。

现在，我们计划出版一套丛书，专门选编抗日战争时期来华的外国记者（包括作家或其他方面人士）所写的，报道或者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迹的著作。

出版这些著作的目的有二：

一是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看看这些外国同行如何观察、分析、反映中国的抗日战争？从采访与写

作的角度，看看他们如何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他们的文采怎样？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特别是有些出自名家手笔的佳作，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同世界上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相比较，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较迟，发展较慢，技术设备等也比较落后，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近百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事业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中国兴起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从一开始它就显现出磅礴的气势，使得剥削阶级的一切报刊相形见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尽管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在解放区则有十分严重的物质困难（这是国民党及外国侵略者的封锁造成的），它却仍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全国解放，最终打破了桎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障碍，使它进入了飞跃发展的新时期。在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给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但是，即使有了今日这样空前规模的发展，想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前景，也不能妄自尊大，还应看到不足的地方。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拿别人的长处来补救自己的短缺，是需要我们长期努力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目的。

二是为我国的中共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提供研究参考资料。我们选编的这些著作，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每本书都或多或少地，或详或略地记述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派

势力的动态，涉及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国民政府是在中国大陆上进行反动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一方面，它一贯地压制言论自由，实行原稿审查酷政，不许报刊反映事实的真相，他们象怕揭露自己身上的脓疮一样，害怕被人揭露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反动措施以及人民极端痛苦的生活。

另一方面，它只知穷兵赎武，不思进行建设，而在有关统计、图书馆、博物馆方面的建树，几等于零。这个政府囿于短视的眼光和狭隘的阶级私利，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仍继续执行压制群众、限制言论，特别限制报刊报道共产党、解放区、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战业绩。而在各解放区内，虽有民主自由的环境，人民的新闻事业有了广阔发展余地，但是由于战争的残酷破坏，频繁的战争所造成的人们的奔忙，日寇、汪精卫、蒋介石三方的严密封锁造成的异常严重的物质困难，当时各方面的档案、资料也难系统地整理、保存下来。因此，在中国，一个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近代史、现代史、中共党史的专家学者，其最大的困难和苦恼，就是缺乏系统地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或社会调查统计材料。现在选编出版的这些著作中的资料，尽管是一些片断，在内容上比较零碎，或者就其准确性上说来也不尽确切。但是，根据我们读后的印象，毕竟大多数是比较翔实可靠的。当然，由于作者的立场不同，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往往表现很大的差异，确属难以避免的现象。只要我们认真查对其他有关资料，认真地进行分析，是能够识别有关资料的真伪的。

基于以上考虑，这套丛书选择的标准，主要是看每本书的内容，首先衡量有无研究、参考的价值。如果在资料价值方面不足，而有流畅的文笔，在文章风格方面又有可取之处，也酌情少量选入。

这套丛书定名为“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编选工作根据有关著作搜集情况而定。但在装帧、封面以及印制规格上力求统一。根据现在已汇集的著作，初步计划出版十本，准备一、两年内出齐。

这套丛书，大部分是过去出版过的中译本。这次重新出版的时候，只要原来译文通顺，忠于原著，只在文字上作些整理（主要是改正错字，个别词句上的文字修饰，尽可能地统一译名，但若寻找不到原著而有译名与别处不一致的地方，暂时只好保持原貌。如果发现原来译本毛病较多，则拟请有关同志对照原著加以校订、修改或者重译。还有一些内容充实，在过去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尚未译成中文的，拟约请人翻译。如果能够找到有关资料，对每本书的原著者生平（或其有关著作当时发生的影响、所起的作用），作一简短的介绍。

目 录

一、迁入华盛顿.....	(1)
二、战争中前往中国.....	(17)
三、在重庆安顿下来.....	(37)
四、玛丽·梅乐士与战略服务局.....	(55)
五、学术中心与美国的利益.....	(65)
六、1943年——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	(88)
七、发现了左派.....	(118)
八、回华盛顿战时情报局工作.....	(146)
九、战后中国.....	(160)
跋.....	穆欣 (181)

一、迁入华盛顿

珍珠港事件前四个月，我被美国政府征召参加为战争服务的学术机构。此后五年我暂时离开哈佛。首先在华盛顿度过一年（1941年8月——1942年8月），然后，在中国度过一年零三个月（1942年9月——1943年12月），在华盛顿住了一年零八个月（1944年1月——1945年8月），最后又在中国度过九个月（1945年9月——1946年7月）。我34岁到39岁时的这段风险经历把我带入了世界性事务中去，并无疑地改变了我。正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战争年代的经历使我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思想与如何采取行动。这是由于战争提出了思想和组织方面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具有创造性的行动。

1941年夏，比尔·杜诺万上校作为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长，正致力于建立全球范围的情报和特工组织。情报协调局下属的研究分析处是用以支持其它部门的一个独立组织。它的指导思想是：对各种事实进行分析，才能弄清情况；这对将采取的各种行动是否正确，关系重大。研究分析处的人员主要来自各大学。对他们的要求是：要象他们以往在学术界那

样，以严格的学者态度研究问题的现状及将来。

威廉斯学院院长詹姆士·芬尼·巴克斯特三世被聘为研究分析处主任。巴克斯特约请兰格参加，兰格又推荐麦凯，麦凯又推荐了我。于是，我们四人于1941年8月离开历史系前往华盛顿。8月13日早晨9时15分，在宾州大街与宪法大街路口的空荡荡的鼎盛大厦中，巴克斯特、兰格、麦凯以及兰格的得意门生，俄国问题专家菲利普·莫斯利举行首次会议，商讨研究分析处如何建立。为使学者的工作能在军事问题上发生作用，他们需要陆海军人员与情报协调局人员合作。当时，国会图书馆新楼正好落成，情报协调局研究人员就在国会图书馆新楼中着手工作，但是，国会图书馆各研究组的研究报告都直接提供情报协调局总部（它坐落在华盛顿市区的另一端25号街与西北E街路口）。SI（秘密情报部）和SO（特工部）也坐落在那里。

巴克斯特和兰格从全国学术界物色各种专家。他们招聘到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多年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约瑟夫·拉尔斯顿·海顿教授。他是一位远东问题专家，曾在菲律宾大学任教，并于1933—1935年担任菲律宾副总督。1941年他的大作《菲律宾：国家发展的研究》刚问世。与此同时，唐·麦凯负责把国务院每天收到的无数电报摘要提供给研究分析处，以便研究分析处能够分享各种情报——正如神怪小说中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缝制没有生命的人像，需要通过电流以使人像得到生命。

当时我还很年轻，只发表了几篇论文，在大学不过是个讲

师,但是,我主张使用中国和日本的材料来研究中国和日本,并成为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叫我去啃的第一块骨头是海军方面提供的日本造船与铝、钢和飞机制造的情报。这是我在前一天访问海军情报局得知的一份重要情报,杜诺万上校要求对它作出鉴定。于是我花费了一个下午。这份情报是由伪装成渔民、香客的间谍进行观测而拼凑成的,此外还有不知来源的统计和有关新机场和工厂的各种名单(后来获悉它是英国方面的情报)。情报中提到日本工程师正在“勘测由下关到朝鲜釜山之间的海底隧道,那不过是横跨对马海峡,相距122英里。”

我认为这份报告不准确,从日本报刊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巴格斯特和我向杜诺万上校提出我们的看法。杜诺万给我的印象是“平稳而优柔寡断,办事举棋不定”。他的确办事举棋不定,但另一方面,那正表现出他力求使工作具有创造性。至于优柔寡断嘛,他决不是那种人。

此后不久,我就同时要着手两三方面的工作——帮助国会图书馆建立远东组,其中包括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帮助杜诺万上校在政府各机构中间证明:新建的情报协调局网罗有专门知识的学者,是十分有价值的;并且要结识在华盛顿的所有“中国通”们。当时,每一个政府机构都骤然间感到需要谙悉中国情况的人员。我们在北京或中国各地四年期间结识的那批朋友,很快就象菜肴上的辣油那样浇遍全城,而且每周都有更多的老中国通到来。

我们夫妇在我的同学比尔·杨曼夫妇家中下榻历时几周。杨曼的夫人艾尔西·珀金斯曾一度在我们北京的家中借住,

他们夫妇最初相识也是在我们家中。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比尔是联邦能源委员会的首席顾问。这时，他与汤姆·考克林合伙经营法律事务所。他们参与宋子文建立的“中国防务供应公司”。艾尔西的先辈曾经从事美国早年对华贸易，现在，她的丈夫又从事一种新型的对华贸易。这个公司一直继续到战争结束以后。最后，宋子文聘请比尔担任他的房地产经营代理人。

威尔玛只用了几天功夫就找到一处舒适方便的房屋，它坐落在乔治城区34号大街（西南段）1306号，有一个很大的客厅、厨房、两间卧室和一个小花园。我们立即签订了合同，准备从9月1日迁进新居。

8月14日，我去看望劳合林·柯里。1928年，劳合林还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讲师、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经过拉福莱夫人——伊萨贝拉的介绍，在麦迪逊与拉福莱的连襟，那与柯里夫妇会过面。柯里一度在联邦储备局工作，后来成为罗斯福的六名行政助理之一，1941年初被罗斯福派往中国去见蒋介石，并被任命主持租借法案和对中国的活动。

柯里博士是白宫工作班子的一员，他的办公室在国务院大厦（现在的行政办公大厦）二楼，正在国务院远东司办公室下面，房间很大，有两个秘书。当时，他正为滇缅公路的种种问题大伤脑筋，为此把纽约的一些卡车运输公司经理们派去组织运输工作。这条公路是中国取得供应的主要血管，然而它却腐败透顶。那些司机，连为机件加油都不会，却知道怎样贩运私货。派去的纽约佬通常不是好对付的，但是，在一个串通抵制他们的环境里，却是束手无策。

在劳合^①那里，我发现他实际是克莱尔·陈纳德上校的后台。当时，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空军团（一支非官方的雇佣空军）配备有一百架P—40型歼击机，正在缅甸秘密训练之中。后来，情报协调局研究“对华援助”这个题目时，我为他们安排利用劳合的档案，以说明对华援助的初期情况。

劳合的经费预算中没有款项聘请助手。经过几个月周折，最后到12月里，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我以情报协调局委派名义，用部分时间协助劳合工作。这样做一举四得，对劳合，对我，对情报协调局对战争都有好处。因此，圣诞节时，我就在劳合办公室旁边224号房间开始办公，电话号码是“白宫80号”，还能有比这更体面的身份象征吗？

就这样，我在权力大厦的走廊里逐步上升，其实当时我的工作很清闲，无非是到处串门，与人谈话，从中收集情报，解决一些次要问题。这项工作很有趣，使我在战争即将爆发的1941年秋季，对那些正在制订对华政策的戏剧性人物，有一个观察的机会。

继柯里之后的演员表上，领衔的是斯坦利·库·荷恩贝格。他和我，从外表看来，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来自中西部，在威斯康辛大学时都参加同一个联谊会，还属于其中同一个支部，我们又都接受过罗氏奖学金，在哈佛又是历史系前后同事，他讲授“1793年以后的远东”一课，以后由我接任。有时，我甚至担心，我们两人连脾性都一样。

① 劳合林的名字缩称。——译注

8月15日，我打电话给荷恩贝克博士，告诉他，我到华盛顿工作了。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很粗暴生硬，问我，杜诺万打算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任务是怎样理解的？他为什么把这么多人搞到华盛顿来？我表示不知道，这也是事实。我又说，我以为他是一切都了若指掌的。当然，我只是作为老相识，和他在电话里作非正式谈话，我以为这并无不妥之处，因为我还没有被派到哪个部门、哪一个人手下；我希望得到他的意见。

几天以后，威尔玛和我去看望他，只是喝了点应酬酒，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显然，他认为对华政策问题，只要有他就够了，至于柯里，无非是办点具体事情。

斯坦利的书房，头顶上有各种绳竿，写字台是可以开合的新鲜玩意儿。这一切都被组合在一起，适宜于动作缓慢的人，土里土气，正象他本人一样。

如果从某个人的事业可以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弱点，则应属斯坦利·荷恩贝克了。他在中国的生涯是从1909—1913年(辛亥革命前后)，在中国官办学院里任教四年，这正是他获得罗氏奖金(1904—1907年)之后，那边对他在语言上并没有要求。他的学术专业是政治学。当时政治学刚从历史学分离出来，但仍与法学有密切关系。1911年他在威斯康辛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老师是保罗·芮恩施教授，芮恩施后来成为威尔逊派驻中国的公使。荷恩贝克于1916年发表《现代远东政治》一书，1914—1917年间，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位陆军上尉，由于在1919年凡尔赛和谈中充当了远东问题专家而一跃成名，接着又在1921年参加华盛顿会议。以后他在政府中担任专家。1924年至1928年，转入哈佛大学讲授远东历史。1927年发表了《今日中国》一书。1928年又回华盛顿担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擅长于把法律义务和道德原则搅拌在一起，这完全适合美国一贯夸耀的开放政策。这种陈腐而软弱的外交理论，在当时却很合荷恩贝克的口味。这样可以既站在美国立场维护法律形式，又站在中国立场玩弄正义的词句，两方面他都可算作相应的美国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在国务院生涯中最奇特的方面是：他并不是职业外交官，只是个民间专家，而1937年以后却在国务院远东司主管中国和日本科，凡涉及这两国的事务，均需由他过目，并得到他的批准。这种不寻常的安排表明，远东和其他地区不同，这种工作对门外汉来说简直捉摸不透，需要由“懂得”东方的专家来掌握。

这幅图画，问题不少。然而，荷恩贝克博士精力充沛，十分自信，也很精明。他也和其他的中国通一样——自封或被认为具有凡人所无的奥秘知识。他到过中国，也讲授过中国现代史，但是这并未曾使他认识到自己（以及每一个人）多么缺少知识，相反，这一点十分有限的知识却给他带来了成功的经验，并给予他十足的自信心。他只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到过中国，而中国发生过好几次革命，他都不在场，因此，那些革命都在他的视野之外，但这对他毫无妨碍。他的主要特

性就是一种惊人的自以为是。在我们早期的接触中，有一次他曾向我解释说：“美国的远东政策就象在轨道上行驶的火车，轨道早已铺好，目标十分明确，日本人应该懂得这一切，这就全看他们了。”这样，两辆火车要避免迎头相撞，就要看扳道叉的功夫如何了。

1941年8月，曾经在日本和中国服务的外交官们起来反对国务院远东司对日本采取的明显的绥靖政策。当时，国务院远东司的司长是麦克斯·汉密尔顿，他是个毫无见识的人，只知道对他的上司荷恩贝克亦步亦趋。有几名外交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象副国务卿苏姆纳·威尔斯一样，要求对政策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但远东司内的这次分歧被敷衍过去。1944年，远东司的官员们又一次对荷恩贝克造反，指责他对赫尔国务卿封锁重要情报。不久以后，荷恩贝尔被派到荷兰去担任大使，他的官运就此完结。

斯坦利·荷恩贝克认为：决策者不需要对实地情况有直接接触，因为一切情报都会送到国务院，经过他的办公桌，唯有这时，一个人才能看到全貌。这是他把自己的弱点说成自己的优点的办法。荷恩贝克的聪明年轻的助手阿尔格·希斯，为这种有害的思想当吹鼓手。我以前不认识他，他远不是一个激进分子。和我熟悉的人，都认为他对荷恩贝克拘守条文的保守思想，太驯顺了。他对远东一无所知，唯一拿手的是程序和礼宾事宜。

在国务院管界内，最优秀的人物首推约翰·佩顿·戴维斯。他是在四川出生，离开北京后，曾到沈阳旅行一圈，这